

Hsu
Shih
Chang

徐世昌

民国总统自叙

水晶狐狸的宦途梦

民国何在，
总统何为？

家书，手札，密电，日记，诗文……

在总统自叙中回到历史“现场”

窥探民国

金宏奎 选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www.jswenxue.com

民国
总统
自叙

徐世昌

Hsu Shih Chang

金宏奎 选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徐世昌 / 金宏奎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民国总统自叙 / 石钟扬主编)

ISBN 978-7-5399-7590-0

I. ①徐… II. ①金… III. ①徐世昌 (1855~1939)
—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6644 号

书 名	徐世昌
主 编	石钟扬
编 选	金宏奎
责 任 编 辑	刘 佳
装 帧 设 计	周伟伟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590-0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统何为

——《民国总统自叙丛书》总序

石钟扬

一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此非但史家之高论，亦乃残酷之事实。

辛亥革命最响亮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四字言破坏，锁定革命对象；后四字言建设，标示革命前景。“驱除鞑虏”，说白了就是去驱满清专制统治者，而非世俗所云杀尽满人，然其变政治革命为民族革命，扩大了统战阵线，缩小了打击目标，立即成为“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令广大民众的积愤找到了喷射口。终是满清王朝气数已尽，西太后与光绪帝相携入土后，清廷只剩几个孤儿寡母和昏聩糊涂的大臣，守制无方，改革无量。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未经摧枯拉朽之力，它就土崩瓦解。虽说是千年之帝制一朝改弦易辙，并未大动干戈，涂炭生灵。皇室得优待而和平退位，较之此前此后以人头换王位都来得文明，故曰“鞑虏易驱”。

那么民国呢？

辛亥革命与民国成立至今皆逾百年，从1912年到1928年为北洋时代，前后换了13任总统（包括临时总统，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大元帅等）。从1928年到1949年为蒋氏时代，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做的是终身总统。蒋经国接任到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党禁报禁，几经努力才创建了个“台湾模式”。百年沧桑，“民国”建成了么？史家的答案是：四不像！

二

民国何似？

孙中山是民国的总设计师。辛亥革命刚有点眉目，实力优于威望的黎元洪与威望高于实力的黄兴在排座次上闹了两个星期的哑剧，让孙中山从美国打工场兼程赶到上海码头。史家有云，黎、黄二帅得一即可安天下，不幸两人相持不下，孙中山即以绝对优势，当选了民国第一任临时

大总统,时年46岁。一向与孙中山不睦的章太炎说,这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言下之意,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孙中山。然而章疯子忘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



1911年12月30日,《民立报》刊载了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电报稿

理,则应属孙文。”孙中山凭此三条当选。当选之后对民国影响至大的自然是他的“建国学理”。孙初抵上海时,革命军粮草俱乏,时人风传他带回巨款,足解燃眉之急。当中外记者以此相询,孙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

此革命精神即是金不换的“建国学理”。有别千年帝制的“民国”无有学理,焉能建成?

孙中山建国学理之精髓在“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在驱除鞑虏时,民族主义为首选;救民于水火之中,则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而建立民国确立国体,则以民权为立国之本,以民权主义内保民生,外争民族地位。民权归根到底是民治,是法治,是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再加考试、监察五权独立,同时又有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由人民掌握)制约的宪政。

凡此种种,皆缘孙氏以美为师:“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亦即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

近代中国既无先进的生产力,也无先进的文化,它是以落后挨打的身份起步现代化的。如果说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云云,启动的是“洋务”,是科技的“四个现代化”;那么孙中山追求的共和制,给力的是“政务”,是“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会变成一摊烂泥。可见孙中山的宪政设计与尝试是何等重要。其“建国学理”并非一次完成,也非一成不变,然其初衷大抵如上所述。秉此初衷,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有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

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此誓词之精义有三：其一，民国乃有别满洲专制政府，是以民、民意为主旨的民治政府；其二，临时总统制天职是为国为民服务，既非终生制，也非一党专利，完成使命即可解职；其三，令满清王朝彻底退位，令民国卓立于世界之林，非辛亥革命一蹴而就，还得借助外力。

而那外力是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的袁世凯。早在孙中山未归之前黄兴就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致信袁世凯，劝他反戈一击，“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袁世凯果然以和平手段逼清宫退位，他也剪辮告别清廷；孙中山果然解职让位于袁世凯。此两者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之盛事，仅此即足令孙、袁名垂青史。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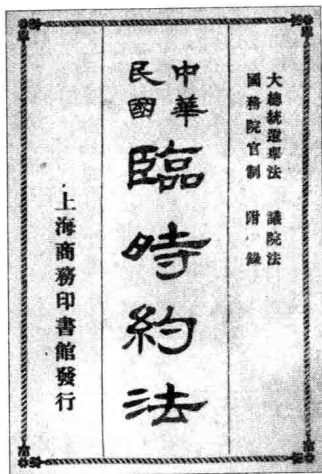
三

孙中山奋斗三十年，十次起义前赴后继，结果只做了45天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就职，2月24日辞职），到4月1日正式解职，实际担当政务也只三个月。他的解职让位在革命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自杀以表抗议。为安抚人心，孙中山慨然致电报章，公布自己的心声：

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位之征。

此电内容丰富，最精彩的是给总统定位为“国民公仆”，其在法下而非法上；在法上者无法无天，在法下者则“当守宪法”且受舆论监督。这

“当守宪法”，那么宪法何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受过西方科学训练，深知法律对国家之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他有道：“立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在诸法中，他尤其重视宪法，认为“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和专制的大机器”。宪法是“人民公意之表示”，是“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基于此，孙中山就职伊始就主持将武昌革命军中央政府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订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除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

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条文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模式由原定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变大总统为虚位元首。大致体现了分权制衡这一宪政精髓。此即近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民元约法》，1912年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

“当守宪法”之“当”，则见此乃中山及国人之愿望。然此后有谁破坏约法，解散国会就不得人心，有谁复辟称帝则更为国人所不容，就会有人以“约法”为旗帜与之抗争，甚至宣战。民初护国、护法之战皆因之而起。

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有言：“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孙中山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这就是“民元约法”的权威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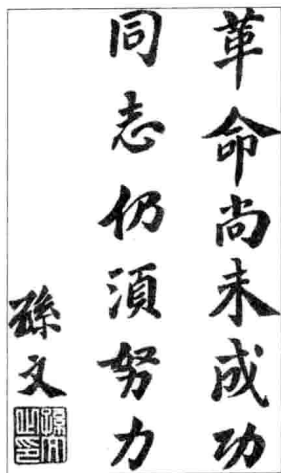
凝聚着民国志士仁人智慧与鲜血的“民元约法”，虽然没有阻挡住袁世凯称帝，也没有制止纷纭的“府院之争”，更没有平息南北干戈对

峙……但其至少制约了一些人的行为,成就了一些人的功绩,更重要的是标示着中国国体现代化的方向。即使袁世凯悍然称帝,也仅八十三天就在众叛亲离中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含恨而亡,临终托孤,其念念不忘的也是“约法”,遗书则期待“看中国再造共和”,并不像有的人真的是带着花岗岩头脑进棺材。尔后的总统其功过则皆以“再造共和”为见证。

四

遗憾的是“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自己的建国学理由以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从以法治国转向了以党治国。其所谓的以党治国实则一党(即国民党)治国,非两党制或多党制;而且要全党附从他一人,说是“再举革命,非我不行”,“除我之外无革命之导师”,甚至连“附从总理”、“附从领袖”的提法都被否定。虽然他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也规定其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也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日程,承诺终将还政于民,而其全过程都由国民党单独完成,说是“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如此这般,孙中山自己就有违初衷,背离约法。于是“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是党权至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所幸孙中山始终是个理想家,设计家,在野的批判家,不是实行家,只当过两任短暂的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并未真正执政。如果他的革命方略付之实践也可能是如他所言“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当初民国的设计是要走向共和,实行宪政的,而任何形式的集权都不能称之为宪政。晚年走向以党治国,领袖至上的孙中山当与称帝的袁世凯有异曲同工之糟。诚如西哲所云:“不受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糟糕而危险的东西……无论它被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无论它被称为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论它被称为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我都会说,他播下了暴政的种子。”蒋介石接过这颗种子,经营了南京政府,终因“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而败走台湾。孙中山未及料到和看到这种结局。1925年3月12日劳顿不堪的孙中山与世长辞,留下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为“民国难建”作了注脚。

民国难建,原因太多,而朝野尤其是最高行政长官对国体模式的选择与实行关系尤大。就民国而言,其有多种选择,或欧美式之民治(法



孙中山遗训

制)、或苏俄式之党治、或日本式之君主立宪制。凡此种种,民国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民国总统也不同程度地为振兴中华做过努力,也各自有过不可抹煞的政绩。但民国尝试的种种外来国体模式都是焊接在中国三千年帝制传统模式的躯体上,都受到其严重侵染。“百代犹行秦法政。”毛泽东氏一言以蔽之,君主专制传统势力何其强大。民国以推翻帝制为宗旨,却免不了为之污染。不说别的,仅于总统之前加一个“大”字,即使是临时的或非常的也未幸免,就是世界奇闻,就是大中华脸谱的写照,这一中国特色何尝没有帝王意识潜伏其中。民国是啥模式都有点啥模式都不彻

底,故曰“四不像”。不过其主色调是中国特色与苏俄特色的混合体,尤其是南京政府,尽管蒋介石对苏联政权早有异议。

民国历史证明,选择(选举)总统固然重要,而调教总统则尤不可等闲视之,可是调教总统又谈何容易。中国传统意识往往将“成王败寇”延伸为“政治地位有多高水平就有多高”之定式。贵为总统,乃先知先觉,乃大彻大悟,乃真理化身,甚至被宗教神化,谁能调教,谁敢调教!除法律、时局、战争之外,古有王者师、言臣,今亦有诤友、诤臣如胡适。二十世纪30年代胡适反复呼吁,国民党废除党治,实行法治;抛弃专制,实行宪政,断定“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法的政敌的监督”,而“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方法”。指出国家领导人“必须是一国的领袖而不是一党一派的领袖”,“他的眼光必须超出党的利益之外,必须看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不能如此,决不够资格做一国的领袖”。作为一个“守法护宪的领袖”,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最高领袖是“处高位”,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胡适1932年11月在汉口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就郑重送上倡导无为

哲学的《淮南王书》，算是对“小事不能糊涂”的蒋介石的应时良药，结果却无异对牛弹琴。

总统不可调教，因而只能指望其自身的素质、教养与觉悟。民国总统之基本素质如何？总统素质令其在总统位上有何作为？且带来何种结局？其实有多种民国史与总统传记在论说着，奈何后见之明的种种著述或有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改写、注水以至失真之嫌。天下何处有信史！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看总统们是怎么自说自话的。于是就有了这套《民国总统自叙丛书》。丛书首选了袁世凯（1859 - 1916）、黎元洪（1864 - 1928）、徐世昌（1855 - 1939）、段祺瑞（1865 - 1936），这四位故事较多而被研究较少的总统。他们四位都曾是前清之能臣，思想较为进步且多有作为。黎元洪、段祺瑞都是在张之洞、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时崭露头角的军事人才，徐世昌虽为文人，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过要职。也就是说袁氏之外的三位总统，皆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之编为一套丛书，分则自成体系，合则有似民国编年实录。这四位前清能臣都当上了民国总统，本就有传奇色彩；而他们间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插入南北对峙情节就更可观；此四位总统都属北洋，到1927年北伐战争则沦为“革命”对象，除袁世凯没有赶上此一幕，其他三位都是特殊“看客”，他们的观点当别有另一番滋味……

与我此前策划的《民国现场报导丛书》（出版时称为“可触摸的民国·现场”版）一样，请了四位少帅操刀，他们忙乎了一个暑假。今年暑假燥热无比，每部书又都是汗水泡出来的。尤其是徐世昌、段祺瑞之日记难以获读，无文献你无法代总统去自叙，其难度远超过当初的预想。不过，只要读者爱读且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我们也就乐在其中了，而且尽可能将民国人物自叙系列丛书次第进行下去，以飨读者诸君。

于此还有句多余的话要说，凡人皆有虚荣心乃至自恋情结，总统或许更甚。因而别以为读了总统自叙就真的进入了历史现场。对总统尤须听其言，观其行，千万别让总统忽悠了。

前言：徐世昌的那些事儿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很难得出让各方心悦诚服的结论，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总统们。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集各种复杂因子于一身的矛盾体，就是一个“烦事儿”特多的存在。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民国总统们，大都有比较相似的命运特征。他们有晚清遗民的传统基因，又有急于仿效西洋的现代追求。他们想从清廷的残梦中醒过来，他们又会不合时宜地做起“皇帝梦”。他们总是打着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旗号，却茫然于无切实可行之措施，结果只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中成就了一场又一场的“历史闹剧”。逝去的总统们，已经没有机会对自己的行为说点什么。而今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更是五花八门，掩卷思酌，总觉得有那么几分言过其实和“小人之心”，未能设身处地地还原历史情境，并形成真实的认识。鉴于此，让徐世昌的那些事，引领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纷乱的时代。

成长的那些事儿

先祖的遗训及家世影响了徐世昌一生。徐世昌曾祖名廉愕，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进士，官湖南知县；祖父名思穆，官河南中河通判；父亲名嘉贤，未仕早卒，从此家道中落。年仅七岁的徐世昌和五岁的胞弟世光与母亲刘氏相依为命，寄居在开封城内的双龙巷。其母刘氏系清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的后代，持家、教子颇有规矩。“刘太夫人课子力学不稍姑息，每以夏楚送塾请师严责，学有进则喜，归时必令在几案间，温习书史，不使稍辍。自幼时已如此。”徐世昌十一岁时，举家移居河南省城南门内小纸坊街寓宅，家境益困。“刘太夫人针黹纺绩度日，仍请诸父聘贤师教公兄弟。时论以汝祖父宅心厚，居家以忍让为先，任国事则不避艰险，汝父至孝，少有大志郁郁以终，其所以振家声绍先业者，惟尔等是望。公悚然，志不敢忘。”刘夫人督促徐氏兄弟学习“无少宽假，常于师课课后，寒夜不寐，为道家世盛衰之故及古今忠孝故事以侑睡。”1866年，徐世昌的六叔曾祖士醇公任鄢陵知县，知其一家生计不易维持，命全眷往依之。刘夫人“以宗祧之重，力排众议，不肯依附于人，且恐家世极盛之后，托人余荫不习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日。鄢陵公解任归，每见刘太夫人即感叹加奖，曰‘汝苦心支持大局，又善教两子，将来必

幼年时期的徐世昌因家道中落,备尝人生艰辛,而对其真正的考验始于同治九年。十六岁的徐世昌因“叔父宁陵公有事出省”而担负起贍家的重任,授课、做幕宾、办信牒、兼会计,辛苦艰难,可想而知。在经受磨砺的岁月里,徐世昌并未因此耽搁自己的功课,而是继续读书,写文章。二十岁的时候,受其表叔考中进士的影响,徐世昌顿觉家境日艰,不由科第起家,无以奉老亲,益奋然于学,为日后考取功名做起了准备。在官衙混迹的日子为徐世昌积攒了很多为官经验和人脉。在洛阳知县路渔宾府中授馆课时,“识潘鼎甫、谢仲渠、王五美、孙景崧、倪宽夫诸君,皆读书作文立身涉世之益友,又识任实之煥奎、袁仲青照葵诸君。”这期间,徐世昌还结识了和自己一生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物——袁世凯。二十五岁时,“四川李覲侯大令约至其署,办文牒。袁端敏公祠堂有园林,在府城暇至园游览,袁慰廷官保少公四岁,在园读书,见公状貌伟然,殷勤接晤,纵谈当世之务,惊以为奇,委心纳交。同时相识尚有淮宁任孝廉道乡。”徐世昌在日记^①中如此记述他与袁世凯的相识过程。徐比袁长四岁,后结为金兰兄弟。

做官的那些事儿

徐世昌早年仕途颇为坎坷。二十五岁时初试不中,只能折回河南重操旧业,寄身县衙,办理文牒。光绪八年,徐世昌中式第154名举人,其弟世光也以75名中式,这一年徐世昌二十八岁。“按光绪壬午科顺天乡试中式者定兴鹿氏父子同榜,天津华氏叔侄同榜,公徐氏史弟同榜,江苏钱氏兄弟同榜,大兴桑伯济尚书重宴鹿鸣,其孙桑霖又登第,都下盛传此科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同科,真科名之佳话,亦国家之祥瑞也。”光绪十二年,徐世昌以殿试二甲,朝考一等中进士,遂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三十二岁。三年考满,授职编修。三十四岁的徐世昌“晨起览镜,见鬓已有白发,不禁感慨,人生如驹阴过隙,何必日事劳劳。既而思之,甫过三十,正可奋发有为,方不虚生天地间,与草木同腐也。何可同碌碌者流,感叹时序哉,勉力潜修,不可

^① 本书编选的日记部分内容采用《水竹村人年谱稿本两种》中由章梈辑,徐世昌、杨逸民校读的《水竹村人年谱》十五卷本,此稿本皆徐世昌亲自校读过,书中有大量徐世昌朱笔批校和修订;另有杨逸民(名彦)者,亦校读过本书,署“已校读过,改正如字,不知无误字否”。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怠惰，书以自警。”徐世昌在翰林院数十年，生活颇为清苦，也历尽官场冷眼，这种磨练激发了他靠个人奋斗的决心；也正是因为自身无权势可以依靠，使得徐氏更加注重人脉的积累和自身的修炼。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与袁慰廷、康有为诸君，在嵩云草堂议开书局。九月，与张异之、于晦若、文芸阁、梁卓如、汪伯、唐沅子、培英人、李提摸太、美人李佳白、毕德格会晤，设强学会。十一月初十日，丑刻进内，由麟芝庵、徐阴轩两掌院代递练习将才推及练兵封奏，联名者六人。”此后不久，袁世凯受命往小站操练新兵，急需网罗人才，并培植一批自己的亲信，遂邀徐世昌前往小站充任参谋营务处。在小站的岁月，徐世昌以翰林身份降格厕身行伍，其资历最高，武夫出身的军官以忝列门墙为荣。于是，袁世凯麾下之张勋、姜桂题等人纷纷投帖拜师，对其格外尊重。徐世昌在小站办理营务尽心竭力，来往中与后来成为北洋军阀集团骨干的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得以结交，为此后官场上相互攀援利用编织了一张关系网。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慈禧携光绪帝一路西逃至西安。回京任职的徐世昌紧随其后，赶到西安后及时晋见了两宫。适时，徐世昌得张之洞举荐，称“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志趣端正，持躬谨飭，明达时务，办事精细，前在山东巡抚袁世凯军营有年余，兵事甚能考究，实为今日有用之才。”袁世凯也乘机力荐徐世昌，称其“公正笃诚，才识明练。前在臣军中办理营务，遇事能持大体，不避劳怨，调和将士，抚取得宜，全军翕然悦服；尤于时局要政，潜心考究，志切澄清，故以儒臣而晓军情；洞达事务，迹其神明内敛，局干隐然，洵称远到之器”等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终由翰林院编修迁转国子监司业。至此，徐已沉滞编修14年，年已四十八岁矣！然而，由此以后，徐世昌官运亨通，渐入坦途。

光绪三十三年，徐世昌被委以重任，成为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徐世昌主张改东北为三行省，设总督一员，且须“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便可“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一隅”。其实质就是集东北之军事、外交等诸权于总督一人之手。徐世昌被委任为东三省第一任汉人总督。徐世昌在东北的工作值得圈点之处颇多，他改革东三省官制，力兴新政，训练新军，并增开商埠，开设银行，修筑铁路，以图抵制日俄对东三省的控制。另外，还倡办了森林学堂、植物研究所、农业试验场等，这在当时都属于比较先进的新鲜事物。徐世昌在东北展开一

场以兴办洋务、戍边保土为主要内容的“东北洋务运动”，成为其继小站之后施展才能的重要时期。宣统元年，徐世昌以“积老患病，恐误重任”为由开缺回籍，而后徐世昌被加封为“太保”，有受托“照料”清室之责。

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总统之后，徐世昌以遗老自命，寄居青岛，避开了京城的政治漩涡。1914年4月6日，“总统府公布修定约法，有人知会袁总统，特任公为国务卿，约吴辟疆代拟呈辞。初七日晨，吴向之来劝驾，说大总统遣来商酌各事，公约吴辟疆代递呈辞，晚即批敦劝万勿推辞，又派段祺瑞来劝驾，并送去年所辞之勋章，一枚徽章证书，又添派孙慕韩来敦劝，明日即出任事，世伯轩来劝出任事不可推辞。”至此，徐世昌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在国务卿的位子上，徐世昌自是尽心竭力，忙于处理各种公务。他就任后即发布了系列命令，大体上沿袭旧体制，对行政、军事、财政、人事、礼制等方面有所规定，其中规定凡文武吏在清朝所任大小官职，一律列入履历，与在民国的经历同样视为资历。

1915年11月14日，“大总统有命令推公同赵次山、李仲仙、张季直为‘嵩山四友’，陆征祥已补实国务卿，徐世昌乃卸却肩矣。”谕令称：“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只客星之奏……其喻予怀。”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徐世昌在20日的日记中写到：“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1916年5月7日，袁世凯在称帝后的各种忧郁中病逝。徐世昌为其料理后事，日记称：“数十年老友，一旦恒化，为之痛哭，其夫人诸子均出，见甚哀痛，与芝泉诸人议其身身后事。”

1917年6月张勋抵京，他并未兑现入京前允诺的调解府院之争的责任，而是联合复辟分子从故宫中拥出废帝溥仪，复辟清廷，遂以徐世昌为太傅、弼德院院长。而徐氏日记则称，“张勋兵溃败，已释戈不战。张勋诸人已数日不进内，张勋、康有为诸人顾取消复辟，为自保计。如此儿戏，鹵莽灭裂，置国家幼主于不顾，殊堪愤恨。”日记又称：“屡劝张勋罢兵不听，致有今日鹵莽灭裂，焉能成事，张勋已矣。”随后，“连日维持，皇室保存优待条件，并维持京师治安，调获张勋甚为忧，劳体中困病，夜不能寐。”徐世昌为张勋活命奔走，力劝段对张从宽处理，使张勋虽被明令通缉法办，但次年即被“特赦”。

当总统的那些事儿

1918年7月29日，“参议院众议院开联合会议选举总统，共到院四百三十一人，公得当选票四百二十五票，投他名票九，废票二。庶几全体一致贺，客厅舍皆满，世中堂假总理各国国务员皆来道贺，并劝届时就任勿固辞。公拟函电辞当选之总统。”12日，“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送选举证书，文武官来贺喜者甚众，各国公使顾问宾客均陆续来，以次接见。（是日，世中堂代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任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言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在众人的簇拥下，面奏请旨后的徐世昌登上了总统宝座。

徐世昌在其就职宣言中声称：“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全曰南北统一。”徐世昌大力推行“南北和平运动”，多次发表文告，倡言和平。徐世昌上台伊始抓住“廉政”问题，下令整肃吏治。他在1918年11月3日发布的命令中，针对官场上大量的不正之风指出：“清白二字，虽未尽为吏之长，而刻苦一端，要足为保身之本。纵欲鲜不败度，惟俭可以养廉……稽诸古训，设官所以为民，律以共和，僚吏同为公仆，但使职责稍有未尽已不能无愧俸钱，更何忍痛毒间阎，重滋民困”，并以“共励廉隅，力祛批司，正己以资表率，修身以致治平”相号召。接着又于1919年1月撰著《将吏法言》八卷，颁行全国。此书将行政统属建制分督军、省长、道尹、知事四目，以箴规各层官吏，使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达到“设官分职，以为民报”之目的。同时徐世昌下令发展国民经济，筹设劝业、农、工各行，优奖土货，广设国际兑换机关，提倡开采矿业，改良农业，推广林牧，奖劝机织。设整理棉业局，派周学熙督办。五四运动爆发后，徐世昌将曹、陆、章免职。徐世昌还派徐世章到南方征求孙中山对南北议和的意见。

接任总统后，徐世昌起用大量前清官员。其任内首届总理即是曾任前清翰林、御史、奉天右参赞等职的钱能训，其他还有旧下属周树模、朱启钤等官僚政客，特赦后的张勋也被任为热河垦务督办。1921年1月，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会赠徐世昌文学、法学两个博士学位。徐派朱启钤赴法代受，并“为交输文化之一种专使，中国前此所无者。”徐世昌日记称：

“典礼之期，柏卜公使称巴黎大学此种学位最为尊重，世界得此学位者五人，美国威尔逊总统暨公二人典矣，宴后照相，以为纪念。”“初十日，为阳历十月十日之双十节，免贺各官复有来谒贺者。”3月，组建交通大学。徐世昌派叶莽绰为校长。

徐世昌任大总统期间，倡导和平的施政策略颇得人心。上任之初即以大总统身份下令尊重和平，“兹值列强偃武之初，正属吾国肇新之会，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携，尤必粹国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张事业，以应时势而赴时机。”在南方通令休战后，军政府七总裁岑春煊电告徐世昌。为了促成南北和平，徐世昌回电中称：“世昌同时国民，颠覆是惧，况南北一家人也，本无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谋和平，以毅力致统一。……固知诸君亦是国民一分子，困心横虑，冒百艰以求一当，绝无不可解决之端。”

然而，在一个武人当道的年代，文治的思想在理论上合乎民意，实际上无法理顺错综复杂的军阀关系。军阀发难，徐亦无力维持，遂发电称：“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剔忧惶，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绝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6月2日，徐世昌即宣布辞职：“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是日下午，乘车至天津，送者迎者甚众。住其十弟宅，诸弟皆来晤，由是小憩，写字看书作画如常，晤诸亲友亦如常。营筑新居。”

做学问的那些事儿

1922年7月19日，徐世昌“迁居（天津）英租界二十号路新居”，从此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是徐世昌自题的斋名，徐氏不仅爱读书，而且爱藏书，爱印书。徐世昌藏书颇富，曾有《书髓

楼藏书目》八卷行世。他亦勤于著述,已整理付梓的约有 20 余种。此外,他还留下一部卷帙浩繁的日记,其中记述了他三十一岁至八十岁之间的经历。徐世昌任总统期间,首倡诗社“晚晴簃”,设于总统府内,聚会赋诗,后改为“徐东海编书处”,择址班大人胡同,设常务三人,专司编印书籍。徐世昌命王式通等负责摘选全清诗,辑成《晚清籍诗汇》200 卷,计 80 册。编书处的另一功绩是费时九年,编辑了《清儒学案》一书,该书汇集了清一代名家流派学说,共 208 卷,为线装 100 册。

徐世昌撰著、纂辑并印行的书籍尚有多种:宣统三年,辑刊《东三省政略》,记述其任东三省总督时的施政要略。民国三年编订并刊行《退耕堂政书》,以其仕清时之奏议、说帖、函牍、电文等分类编列。民国六年辑成《大清畿辅先哲传》,共 46 卷,以表彰乡贤提倡纲常,使“人人各抱敬恭桑梓之心”。民国七年,辑印《水竹村人诗集》(又名《徐大总统诗集》),凡 12 卷,收录其前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作品。民国八年著成《将吏法言》,颁行全国,用以规范文武大小官吏。徐世昌晚年对刊印文献资料乐此不疲,除上述外,还有《竹窗楹联》、《藤墅俚言》、《拣珠录》等行世。

徐世昌对写字、绘画、收藏均有涉猎,且成果斐然。徐氏擅长书法,尤精行、草二体,宗法苏轼,略变其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中,多可睹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其手。他常作楹联、条幅、横卷分赠亲友僚属,但题款仅署“水竹村人”、“石门山人”,“退耕老人”等别号而不留姓名。晚年习画,多是山水松竹之类的传统题材,墨迹颇多,他画的扇面、立幅等作品不时在著名的《北洋画报》上出现。徐世昌与其弟世章皆喜藏砚。徐世昌还将其藏砚的饰纹、题识制成拓片,集为一册,名之《百砚谱》,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评砚专著。

纵观徐世昌一生,其韶华岁月留在了大清朝(五十七岁授任太保),已是含饴弄孙之龄的徐世昌又踏上了民国政坛(五十九岁出任袁总统的国务卿),后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当上了民国总统(六十四岁当选),历时三年八个月,在位时长仅次于袁世凯。六十八岁卸任,诗文、楹联、画作等身,成果颇丰。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也看到了大变革时局中“文人仕子”耐人寻味的人生际遇。相较于其丰富多元的一生,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似乎都没有太多意义。白坚武在其日记中写到:“凡人得黄老之学,大者可以得国,次者可以守业,其最